

第二節、剷除李士群及其「中共路線」

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六日上海日本憲兵隊岡村中佐邀約李士群至百老匯大樓，岡村稱要彌合李士群與汪政權稅警總團副總團長熊劍東之爭端，然而沒想到參加完岡村及熊劍東的邀宴兩天後，李士群即在蘇州寓所中毒暴斃，由於李士群被毒死的經過例來已討論不少，原因大多歸諸汪政府的內鬥及日方對他的嫌惡，但事實上並不如此單純，本文將從其他角度探討李士群被毒死的原因。

李士群先與丁默邨不合將丁排擠出「七十六號」，後來又與周佛海、羅君強鬧翻，在汪府內部四面楚歌，但民國三十年李得到汪精衛及影佐的支持擔任清鄉委員會秘書長，後來又兼任江蘇省政府主席，聲勢如日中天。民國三十年底太平洋戰爭發生，出於對汪日戰局的悲觀，李士群與「新四軍」的聯絡熱切，這個消息讓重慶偵知，於是決心除掉李士群，恰於此時周佛海已向戴笠投誠，而戴笠派至汪政權臥底的唐生明也已成功打入清鄉委員會，在李士群手下做事，「中統」方面則陳立夫在民國三十一年初也收到了丁默邨的悔過書，於是戴笠及陳立夫皆曾分別向周佛海及丁默邨下達制裁李士群的命令。

李士群原已因內部鬥爭而與丁默邨、周佛海不合，再因清鄉問題而得罪汪政府其他大小官員，且「七十六號」的一些惡行惡狀得罪中日資本家也使日方不滿，於是重慶此次下給周佛海等人對李士群的制裁令乃能發生效力，但其中最關鍵因素是重慶極可能也對日軍動用了謀略戰，也就是重慶由周佛海之手轉送日軍一份李士群與中共勾結的資料，再加上利用日方急於與重慶謀和的心理，於是使李士群最終能在重慶、日本政府、汪政府要人合作下被毒死。李士群之死讓中共藉由李士群於戰後掌握所謂「偽軍」、掌控京滬區的圖謀破滅，對於國民政府戰後順利接收京滬是一大關鍵。李士群的死誠然有幾方面因素但若無重慶最後的制裁令，李士群應該不會死。所以重慶的態度是決定性因素。而李士群的死，標誌著重慶徹底擊垮汪政府特工，並進而能掌握整個汪政權。歷來的研究多只偏於汪府內鬥的因素，或日本政府對李士群的不滿，至於最關鍵的重慶因素則鮮少提及，大陸方面的研究更是無人提及「中共因素」，故本文除再簡略說明內鬥因素外重點將擺在當時國府、中共與美國三方面政治因素探討。

一、內鬥內行、四面楚歌

李士群進入汪政權後分別與丁默邨、周佛海、蘇成德、胡蘭成、羅君強、熊劍東發生過大大小小的權力衝突，其中以對丁默邨、周佛海、羅君強及熊劍東的糾紛與其死關係最大，丁、周、羅三人在戰後審判漢奸的法庭上都宣稱接到戴笠命令參與毒殺李士群，這其中有些不無可能是為求減罪的說詞，但三人最後與李

士群確實幾乎到了水火不容，圖謀置對方於死地的地步。

民國二十四年國民政府為應付中共之叛亂，曾經統合旗下之特務機構，成立一個由陳立夫主持的「調統會報」，當時第一組主任為徐恩曾，著重中共之社會活動，戴笠為第二組主任，著重中共之軍事活動，丁默邨為第三組主任，掌理會報方面之總務事宜¹，所以丁默邨在國民政府特務系統的地位是曾經可以和戴笠及徐恩曾平起平坐的人物，而李士群戰前加入「中統」時則僅是個小角色。丁默邨認為，李士群與上海無淵源，憑他個人是無法吸收到任何一個人至「七十六號」的，故丁到處以老大自居，但李士群的想法則認為當初是他先在香港與日本人接線，若非李的介紹則丁不可能有今日，這是二人分化的心理因素²。丁、李兩人鬥爭最激烈的階段為民國二十八年冬至二十九年春汪政權成立前夕這一段時間，由於幾次事件造成雙方不快。首先是因爭取唐惠民，雙方產生裂痕³，再來則因市黨部委員張小通被「七十六號」逮捕，丁有意網羅但李卻將之秘密處死，引發丁之不滿。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丁默邨曾遭「中統」特務鄭蘋如暗殺未果，因鄭蘋如為丁之情婦，此事令丁顏面盡失，李士群等人大做文章⁴。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汪政府「還都」後，汪政府擬設立社會部與警政部來安插「七十六號」人員，丁想兼得二者兩者引發李之不滿，此時李士群已加入周佛海的「十人團」⁵，為了兩人職位之爭，周佛海夾在丁、李之間甚為苦惱，周曾透過日人晴氣慶胤向丁、李建議，以李專管特務，丁掌警察，但李士群不同意⁶，於是最後給丁默邨社會部及交通部部長職位，警政部部长由周佛海兼任，李士群為警政部政務次長，實際職權由李士群負責⁷，於是丁名義上獲得兩部卻失去了特工領導權，後來周佛海再把警政部長讓給李士群，李成為汪政權特工首領，丁則被排除於特工之外。此後二人嫌隙漸深，周佛海只能不斷彌合二人裂痕⁸，但旋及丁默邨之弟丁時俊在「大世界舞廳」飲酒取樂，突然被兩個白俄⁹擲出

¹ 陳立夫，《成敗之鑑》，(台北:正中書局，民國 83 年 6 月初版)，頁 106~107。

² 天字第一號編著，《七十六號本紀》，(上海:青年文化出版社，民國 37 年 1 月初版)，頁 24。

³ 唐因通渝，導致丁李二人對其處置有不同意見。王惠農，〈李士群與七十六號〉，收在《上海文史資料選輯》，1980 年第 5 輯，總第 33 輯，頁 143。唐惠民任警政部次長時，作者曾為其專員，李士群任江蘇省主席時，作者為省府專員兼事務主任。

⁴ 馬嘯天、汪曼雲遺稿，黃美真整理，《汪偽特工內幕—知情人談知情事》，(新鄉:河南人民出版社)，頁 102~112。

⁵ 該組織為周之親信羅君強於民國二十八年九、十月間所發起，以擁周佛海為目的，金雄白亦為該組織成員。詳見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台北:李敖出版社，民國 77 年)，頁 65。

⁶ 周佛海民國 29 年 2 月 19 日日記，參見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年)，頁 249。

⁷ 天字第一號編著，《七十六號本紀》，(上海:青年文化出版社，民國 37 年 1 月初版)，頁 26~28。

⁸ 周佛海民國 29 年 4 月 17 日日記：「晚召默邨來談，勸其與士群合作，結果甚佳，為之大悅。」

啤酒瓶砸死¹⁰，丁一口咬定是李士群所造的血案，周佛海認為丁默邨太過意氣用事，但亦同情丁因胞弟死亡之心情¹¹，後由李至丁家道歉了事。但此後雙方水火不容而李士群從此卻扶搖直上，官運亨通，最後終於再與周佛海、羅君強產生了嚴重的權力衝突。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周佛海改組後的「十人組織」在「七十六號」舉行結盟，李士群由羅君強拉攏加入，兩人關係親密，羅常至「七十六號」與李談至深夜，投靠周佛海的李士群竟替周派人監視汪精衛，此事為汪精衛知道後叫周至汪寓訓斥了一頓¹²。而羅君強為向李士群示好，甚至向周佛海建議把警政部部长讓給李士群。不多久李士群向周佛海建議成立稅警團，以為培植私人武力之資本，周佛海同意後委由李士群籌辦，羅君強卻勸告周佛海不宜把如此重要任務交給與周系關係不深的李士群，後來周終於同意改由羅君強籌辦，於是周佛海自己兼了稅警團團長，羅君強則當上了副團長，於是羅、李因為此事反目¹³，為了周內部羅、李之不合，周又陷入兩難，又曾勸羅囑其言論行動須盡量避免與李發生誤會，不能使周內部分裂¹⁴。民國三十年初日軍為求掃蕩蘇浙皖三省中共的「新四軍」及重慶「忠義救國軍」等游擊隊，日方提議汪政權進行「肅清方案」¹⁵，周佛海、陳公博等推薦羅君強辦理此事，但李士群暗中求得日軍事顧問晴氣慶胤的幫助，於是李士群最後獲勝，得以江蘇省長身份兼清鄉委員會秘書長¹⁶，於是最後清鄉事務由李包辦，羅君強空歡喜一場。從此羅、李仇恨越結越深，周佛海不僅無法為之排解，李士群最後也公開批評起周佛海，李士群辦了一份「國民新聞」報，李為社長，胡蘭成為主筆，但該報董事長則為周佛海，然而該報社論竟然出現攻擊周佛海及梅思平生活腐化的文章，於是羅君強以稅警團做武力，李士群以「七十六號」為工具，雙方互相攻擊，各有欲得而甘心之勢。雙方劍拔弩張的情形，金雄白將之形容為就像太平天國的東王楊秀清與北王韋昌輝的互鬥，此後周、李

參見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頁288。

⁹ 民國六年，俄國十月革命後逃離紅色蘇聯的俄國人，他們在上海或為保鏢、娼妓、乞丐。見萬墨林，《滬上往事(1)》，(台北:中外圖書出版社，民國63年5月初版)，頁39~40。

¹⁰ 羅君強，〈對汪偽的回憶紀實〉，收在黃美真編，《偽廷幽影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頁67~68。羅君強時任汪政權「邊疆委員會委員長」，屬於周佛海一派。

¹¹ 周佛海民國29年5月25日日記，參見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頁310。

¹² 國史館檔案 抗戰史料 檔號0160.52 1833.66-03 微卷號26 頁1861。

¹³ 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1)》，(台北:李敖出版社，民國77年)，頁151~154。

¹⁴ 周佛海民國29年10月2日日記。見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頁384。

¹⁵ 邵銘煌，〈汪偽政權之建立及其覆亡〉，《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頁191。

¹⁶ 羅君強，〈細說汪偽(下)〉，《傳記文學》，第26卷第3期，民國82年3月號，頁103。

關係逐漸變色¹⁷。

除了羅君強和周佛海之外，李士群得罪胡蘭成及熊劍東也是致命原因之一，胡蘭成是浙江嵊縣人，因家貧被送往俞姓人家當義子，十四歲時曾就讀紹興第五師範附屬小學，於此結識大他四歲的熊劍東，胡還曾傾財資助熊至上海發展的旅費¹⁸。民國二十六年二月，胡蘭成也到了上海，經人介紹進了汪系的「中華日報」任主筆，抗戰爆發後，被調至香港林柏生主持的「南華日報」，汪政權成立後，因得汪精衛賞識胡被任為宣傳部政務次長及「中華日報」主筆¹⁹。後來汪政權中形成公館派與湖南派(周佛海派)²⁰，胡蘭成屬於公館派，因任「中華日報」主筆，常和周佛海唱反調。李士群和羅周反目後急欲向公館派靠攏，李乃藉由胡蘭成向汪精衛靠攏，在胡的建議下汪將「特務委員會」取消，改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部」，李士群任部長，直屬行政院，周佛海的「特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職務被取消，為了報答胡蘭成，李士群辦了一份「國民新聞」報請胡任主編，該報痛加抨擊周佛海為辦「中央儲備銀行」而與日人所訂之經濟協定為喪權辱國²¹，於是周佛海與李士群的矛盾越來越深。

但李、胡不久也鬧翻，原因是吳四寶之死。吳四寶又名吳雲甫，原在上海跑馬場牽馬，也曾為英國人開汽車，後投山東督軍張宗昌，國民革命軍北伐又加入白崇熹部隊任機器腳踏車隊長²²。吳之妻余愛珍是「青幫」季雲卿的乾女兒，李士群亦曾向季「拜帖子」，於是透過季雲卿²³的關係吳四寶認識了李士群，後李士群將吳四寶拉進「七十六號」擔任「特工總部」警衛大隊大隊長，為李士群手下第一員大將，吳、李並結拜為兄弟²⁴，吳四寶組成一個警衛隊，除了和重慶地下

¹⁷ 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台北:李敖出版社，民國 77 年)，頁 158~161。

¹⁸ 胡蘭成，《今生今世(上)》，(台北:遠流出版社，民國 79 年 9 月 16 日初版一刷)，頁 246~247。
胡蘭成戰後避居日本，該書為其於日本寫下之自傳。

¹⁹ 王怡，〈胡蘭成其人其事〉，《傳記文學》，第 67 卷第 6 期，民國 84 年 12 月號，頁 87~88。

²⁰ 據重慶的地下工作人員南京金史生二十九年六月四日電「自汪逆偽組織成立後加以偽維新及各黨派之爭奪，復因權利之衝突，從而派系更多，茲分陳如次：『一、汪係內部在昔已成六派，現隨事勢之變遷，其主要者約分二派：一、公館派：以陳璧君、褚民誼、陳春圃、陳公博、林伯生等逆為主體 二、湖南派：以周佛海、丁默村、羅君強、李士群、梅思平、葉蓬等逆為主幹。』
國史館 抗戰史料 檔號 0160.52 1833.66.-03 微卷號 26 頁 1878~1882。胡蘭成於其自傳中對「公館派」與「周佛海派」間之鬥爭多所提及，見胡蘭成，《今生今世(上)》，(台北:遠流出版社，民國 79 年 9 月 16 日初版一刷)，頁 216~220。

²¹ 胡蘭成，《今生今世(上)》，(台北:遠流出版社，民國 79 年 9 月 16 日初版一刷)，頁 220~223。

²² 胡蘭成，《今生今世》，(台北:遠行出版社，民國 65 年 7 月)，頁 429。該書為節略版。

²³ 李士群及丁默村都曾拜季雲卿為「老頭子」，民國二十八年九月間季雲卿為重慶「三青團上海支團部」行動人員暗殺，暗殺者曾獲賞金三千元。(吳紹澍電朱家驊—上海二十八年九月十九日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驊檔案》，第八十函:滬市制裁(制裁漢奸)。

²⁴ 胡蘭成，《今生今世》，(台北:遠行出版社，民國 65 年 7 月)，頁 438。胡蘭成與吳四寶夫婦為好友，戰後胡甚至在日本與吳四寶遺孀余愛珍結婚，故胡之自傳對吳夫婦多所隱諱迴護，對於吳

工作人員互相火拼暗殺外，也犯下不少搶劫、綁票案件，憑藉暴力發跡的吳四寶在「七十六號」內形成一股獨特的勢力，聲名且在李士群之上，但吳四寶的行爲越來越乖張，吳不僅向滬西賭台索保護費還偷賣「白粉」，甚至連日本人爲後台的販賣鴉片的「土膏行」都須按月繳規費。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吳四寶和李士群合謀綁架了富商「中國化學工業社」老闆方仙液，誣指其和重慶有關，要他出巨款贖身，方仙液不從，遂被刑求至死²⁵。吳四寶等人的行徑曾被當時重慶「大公報」做爲宣傳材料，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重慶大公報：

汪逆偽組織近因經濟窘境，乃在採用綁票勒贖為籌款方法，上月榮宗敬之子榮爾仁被偽方綁去，結果以一百萬元獲釋放，徐懋堂、楮聯泰及愛爾德行丁李超等先後被綁架勒贖 汪逆用此方法，籌款五十萬元，充偽中央銀行基金²⁶。

吳四寶的行徑漸對汪政府之聲譽造成傷害，有一次「七十六號」還和法租界警察在靜安寺路爆發槍戰，轟動一時²⁷。吳最後竟在太歲頭上動土，民國三十年底，吳竟派其徒張國震於「正金銀行」埋伏，伺機搶劫日軍的金磚，雖未成功但事已爲日人偵知，日本人要逮捕吳四寶與張國震，正好李士群也深感吳四寶在「七十六號」勢力漸大，苦無機會除掉這個眼中釘²⁸。後來吳四寶夫婦於二百名日本憲兵包圍中逃脫，李士群則商得汪精衛同意下了通緝令，吳妻余愛珍只得打電話求救好友胡蘭成²⁹，胡蘭成爲救好友只好去找李士群，李士群用身家性命保證吳若到日憲兵隊自首將獲保釋，吳終於出面自首，但吳至日憲兵隊後卻未立刻釋放，於是胡蘭成再到蘇州找李士群，請日人釋放吳四寶，李終於答應³⁰。

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三十日日方釋放吳四寶，但日方要求吳須由李士群帶至蘇州看管，吳被李帶至蘇州的第二天卻中毒身亡。據汪曼雲的說法吳曾親口告訴汪曼雲，吳離開日憲兵隊當日中午，守衛曾堅持要吳吃下飯團及菜湯，汪猜測吳因

之劣行胡皆推之爲其他人所爲，未可盡信。

²⁵ 馬嘯天、汪曼雲遺稿，黃美真整理，《汪偽特工內幕—知情人談知情事》，(新鄉:河南人民出版社)，頁 118~123。

²⁶ 國史館檔案 抗戰史料 檔號 0160.52 1833.71 微卷號 27 標題:綁票籌款 頁 457~458。

²⁷ 陳存仁，〈日僞上海市長傅筱庵及其他〉，《傳記文學》，第 59 卷，第 1 期，頁 86~98。陳存仁當時在上海行醫，有一次「七十六號」慕名派人來請陳去爲吳四寶治病，問陳知不知道吳四寶？陳一聽說是吳四寶「當堂就發呆了，連聲說不認識不認識！」。可見吳四寶及「七十六號」在當時已到了令人談虎色變的地步。

²⁸ 蔡德金、尚岳編，《魔窟—汪偽特工總部七十六號》，(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 年 11 月第一版)，頁 181。該書爲汪曼雲、馬嘯天在上海監獄關押期間的供詞。

²⁹ 胡蘭成於結交李士群時常至「七十六號」，因而與吳四寶夫婦成爲好友。見胡蘭成，《今生今世(上)》，(台北:遠流出版社，民國 79 年 9 月 16 日初版一刷)，頁 233~234。

³⁰ 胡蘭成，《今生今世(上)》，(台北:遠流出版社，民國 79 年 9 月 16 日初版一刷)，頁 234~235。

而被毒死³¹，吳之死當時多半人皆認為必為李士群與日軍合謀的結果。對於好友最後竟被李士群毒死，胡蘭成異常憤怒，胡曾說：「後來是因李士群殺了吳四寶，我才與他大大傷了道。」³²，胡還告訴吳妻余愛珍將為吳四寶報仇³³。

二、狡兔三窟、再投中共

李士群之最後會被毒死近因為其聯繫中共的潘漢年。潘漢年於民國前五年一月十二日出生於江蘇省宜興縣陸平村，為一個書香門庭，民國十四年潘離開家鄉至上海中華國語專科學校讀書，同年經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民國十七年，他被調到中共中央宣傳部，隔年秋天擔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第一任書記。民國二十年四月，潘漢年被調至「中央特科」，任二科科長，此期間潘漢年協同陳賡、李克農等在周恩來、陳雲等指揮下果斷清除了顧順章叛變後遺留的隱患³⁴，參與組織、護送中共黨中央(上海)主要領導人員轉移到江西「蘇區」的工作，從此潘即在上海為中共從事地下工作。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下旬抗日戰爭已爆發，由於實行國共合作，紅軍編入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原紅軍駐上海辦事處改稱為「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簡稱「八辦」，可以公開活動，初以李克農為主任，後由潘漢年繼任³⁵。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淪陷前夕，潘對上海淪陷後黨的工作做了佈置後就乘船至香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間從香港回到延安出席中共「六屆六中全會」³⁶。

在延安潘進入新組建的中央社會部工作，該部仍以情報工作為主。民國二十八年五月潘漢年離開延安，經重慶飛到香港治療眼疾並主持香港的情報工作，潘到上海後與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繼續展開情報工作，潘在香港的情報機構甚至打通了國民黨「國際問題研究所」，由該處得到了不少重慶的相關外交情報³⁷，潘也與孔祥熙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胡鄂公取得聯繫，胡也提供不少情

³¹ 蔡德金、尚岳編，《魔窟—汪偽特工總部七十六號》，(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1月第一版)，頁182~183。

³² 胡蘭成，《今生今世(上)》，(台北:遠流出版社，民國79年9月16日初版一刷)，頁233。

³³ 胡蘭成，《今生今世(上)》，(台北:遠流出版社，民國79年9月16日初版一刷)，頁237。

³⁴ 「顧順章案」是「中統」破壞上海中共黨中央的一次重大事件，中共蒙受很大損失，黨中央改遷至江西「蘇區」。參見徐恩曾，《我和共黨鬥爭底回憶》，出版項未詳。

³⁵ 中共上海市黨委史研究室編，《潘漢年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頁44~55。

³⁶ 中共上海市黨委史研究室編，《潘漢年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頁61~62。

³⁷ 「國際問題研究所」於民國二十八年初成立於香港，從事戰時日本情報分析之研究機構，與汪系高宗武之同名機構不同。由軍委會侍從室第六組王芃生中將主任主持。見張令澳，《我在蔣介石侍從室的日子》，(台北:周知文化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84年7月初版一刷)，頁89~104。

報予潘漢年。民國二十八年夏，中共中央任命潘漢年為中央社會部副部長³⁸。民國二十八年九月，潘漢年至上海建立新的情報工作據點，並設立了能和延安、重慶、香港直接聯繫的電台，佈置完畢後潘又回到香港。當時的上海，各方的情報機構匯聚，有國民黨「中統」與「軍統」，汪政權的「七十六號」，日本及英美法蘇的特務機關，上海成爲一個大規模的情報戰戰場，有很多人因而成爲「多面間諜」³⁹。潘漢年深知要獲取更有價值的情報唯有打入敵人的情報機構，於是潘漢年找到了袁殊。

袁殊，胡北人，民國二十年曾由任「中央特科」科長的潘漢年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並爲「中央特科」做情報工作，袁後來不僅打入國民黨「CC派」的特工組織「幹社」，又曾爲上海日本領事館搜集情報，日本外務省的岩井英一資助其留學日本並爲其介紹日本學政界人士。民國二十六年四月袁殊回國後與潘漢年恢復聯繫。抗戰爆發後「軍統」看中袁殊與日本領事館的關係，戴笠乃親訪袁殊，袁殊將此事報告潘漢年，潘希望袁打入「軍統」相機行事，袁乃成爲軍統上海區國際情報組少將組長，「八一三」松滬戰役不久後，潘離開上海，此期間袁殊於上海替「軍統」搜集情報，刺殺漢奸，一再受到「軍統」嘉獎，但同時袁殊與日駐上海總領事館副總領事岩井英一恢復聯繫，並開始幫助岩井對中國開展情報工作，民國二十八年袁殊奉戴笠命暗殺李士群未成功而爲「七十六號」所逮捕⁴⁰，袁殊因此事原本已被判處死刑，但岩井出面將其救出⁴¹。

此時潘漢年回到上海，決定盡力爭取袁殊，於是潘指示袁殊接受岩井的安排，擔任了興亞建國運動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潘漢年還透過袁殊安排不少中共人員進入岩井情報機構「岩井公館」。不久袁殊帶著潘漢年去見岩井，並向岩井表明潘的身份，岩井乃要潘爲其在香港搜集情報，從此雙方互相利用，情報交流⁴²。潘漢年定期交出一份有關重慶或英美情報給岩井，且一面將所得日方情報源源電傳延安⁴³。潘漢年在上海除了打入日本的情報機構外，不久又和李士群取得聯繫。民國二十八年冬，李士群就向中共傳達訊息，希望中共能派人和他取得聯繫，中

³⁸ 尹騏，《潘漢年的情報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頁82~91。

³⁹ 在陳恭澍的書中曾提到一位范行，范行與「軍統」、「梅機關」、中共都有關係是位「多面間諜」。見陳恭澍，《抗戰後期反間活動》，（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75年7月31日初版），頁498~508。

⁴⁰ 見尹騏，〈袁殊諜海風雨十六年〉《炎黃春秋》，2002年，第12期，頁56。

⁴¹ 岩井透過影佐向周佛海保釋，見羅君強，〈細說汪偽(下)〉，《傳記文學》，第26卷第3期，民國82年3月號，頁105。

⁴² 尹騏，《潘漢年的情報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頁95~113。

⁴³ 王朝柱原作，余亦麒提供，〈潘漢年是怎樣當上漢奸的〉《傳記文學》，第69卷第1期，民國85年8月號，頁76。

共中央社會部也決定再利用李士群，於是潘漢年決定派關露至李身邊任雙方聯絡人，關露是當時左派名作家，曾加入「左翼作家聯盟」，亦是中共地下黨員⁴⁴，其實關露與李士群早在「左聯」時期就認識，兩人曾一同在中華日報撰稿⁴⁵。

潘漢年告訴關露，中共中央要掌握蔣、汪、日之間的關係，而且李士群答應提供一定的情報。潘並告誡關露進入汪政權以後只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他會再派一位關露的讀者和關露聯絡，潘最後並保證戰後一定為她洗刷漢奸之名，讓她堂堂正正做人⁴⁶。民國二十九年關露奉派至李士群寓所，李士群告訴關露：「我是反蔣不反共，共產黨也是反蔣的，我們是殊途同歸。」李又說：「我不會跟共產黨過不去的，相反的，我還想幫幫忙。」⁴⁷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下旬日軍佔領香港，靠著岩井英一的關係，中共在港的地下人員竟能由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的協助，安全撤至內地。香港淪陷後，潘的情報工作完全轉移到上海，抵達上海的潘漢年立刻由岩井處得到一張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簽發的有保護作用的特別證件，等於得到一張護身符⁴⁸，岩井英一還帶潘漢年去見當時汪政府最高軍事顧問影佐禎昭，潘向影佐提出要見李士群，理由是潘、李現都從事中日親善和平運動，應該互相聯絡一下，影佐答應了，潘意欲藉此使其暗中策反李投共合法化，並可減輕李士群之心理負擔，潘發現李士群在汪政權中樹敵太多，已悄悄在為自己留退路，潘又發現重慶派在李士群身邊的內線唐生明與李往來頻繁，並得知李已電告戴笠不再捕殺渝方人員，恐渝方先行成功策反李士群，所以覺得應該加緊爭取李士群。⁴⁹

民國三十一年初潘漢年與李士群在李之寓所會面，李士群告訴潘漢年：「中共和新四軍方面有什麼需要幫助的，我將盡力。」李又說：「希望你們對我也多加幫助」，於是雙方約定由袁殊及「特工總部」副廳長兼江蘇實驗區區長的胡鈞鶴擔任聯絡人⁵⁰，其實胡鈞鶴早就加入過中共，民國二十一年任共青團中央書記

⁴⁴ 王朝柱原作，余亦麒提供，〈潘漢年是怎樣當上漢奸的〉《傳記文學》，第 69 卷第 1 期，民國 85 年 8 月號，頁 118~121。

⁴⁵ 周宗奇，〈與魔鬼共舞-記關露打入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滄桑》，2001 年，第 2 期，頁 13。

⁴⁶ 張天民、尹騏、朱一民原著，鍾羽、北雲改編，《諜海奇人—潘漢年》，（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6 年 9 月第一版），頁 219。關露因曾有這一段過去，戰後被中共視為「文化漢奸」，1955 年因潘漢年案被關押審查二年，1967 年文化大革命時又被關押折磨八年，雖於 1983 年獲平反，但隨即吞安眠藥自殺，潘、關同病相憐，潘完全無法實現其承諾。

⁴⁷ 周宗奇，〈與魔鬼共舞-記關露打入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滄桑》，2001 年，第 2 期，頁 16。

⁴⁸ 岩井對潘百般照顧是因潘提供不少國府與英美的情報，但為防授人以柄，被說成「通共」，岩井曾帶潘去見影佐禎昭。尹騏，《潘漢年的情報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 9 月第一版），頁 144。

⁴⁹ 尹騏，《潘漢年的情報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 9 月第一版），頁 144~145。

⁵⁰ 尹騏，《潘漢年的情報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 9 月第一版），頁 146。

時曾被捕，後投靠「中統」，抗戰初期胡被捕後投汪，但自從民國三十年潘漢年就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同胡鈞鶴建立了情報工作關係⁵¹，胡鈞鶴不僅本身與中共聯絡，其下的幾個科長及科員也都是中共黨員⁵²。隔一段時間李士群又主動邀約潘漢年於李之上海愚園路公館會面，因當時汪日正在進行清鄉工作，並由李士群主持江蘇的清鄉，李竟向潘透露清鄉的某些行動計劃，並告知汪日軍隊即將在新四軍根據地蘇北有掃蕩行動，希望「新四軍」有所準備⁵³。這是李士群送給中共的一份大禮，因為李士群的通風報信使得「新四軍」在汪日的清鄉中幾乎沒有受到太大損失，而此舉也連帶使得重慶設計許久藉汪日打擊「新四軍」的目的付諸流水⁵⁴。此外李士群還以大批日軍禁運之統制品物資秘密運交「新四軍」，其中包括共軍所急需的紗、布、紙張、醫藥及日用品⁵⁵。

民國三十一年九月上海租界被日軍佔領後，中共中央決定將上海的「江蘇省委」撤退到「新四軍」根據地，潘漢年請求李士群掩護並提供安全的交通路線，李答應了並約定潘等到蘇北後，雙方用電台繼續聯絡，胡鈞鶴還編了一本密碼交給潘漢年。於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初潘漢年、劉曉(江蘇省委書記)、王堯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等一行五人由胡鈞鶴護送至新四軍淮南根據地。從此胡鈞鶴所提供的密碼本成爲新四軍與李士群間聯繫的管道⁵⁶，在此期間胡鈞鶴還曾兩度派人渡過長江至淮南，給「新四軍」送情報與物資⁵⁷。

民國三十二年春夏之交，「新四軍」和中共「華中局」(局長爲潘漢年)得到消息，汪日又將有大規模掃蕩「新四軍」根據地的行動，而洽在此時胡鈞鶴所編之密碼聯絡不上李士群，於是潘漢年決定親赴上海找李士群搞清楚狀況，民國三十二年四月潘到上海後由胡鈞鶴陪同再至南京，到南京第二天見到了李士群，李士

⁵¹ 文光，〈潘漢年冤案的前前後後〉收在中共上海市黨委史研室編，《潘漢年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頁423。

⁵² 陳恭澍在其書中也不時提到胡鈞鶴的中共身份，見陳恭澍，《抗戰後期反間活動》，(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75年7月31日初版)，頁223~224。

⁵³ 尹騏，《潘漢年的情報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頁146~147。

⁵⁴ 唐生明奉蔣中正及戴笠命於民國二十九年十月打入汪政權，後來擔任汪之「清鄉委員會」軍務處處長，重慶要他利用日軍和汪軍去消滅新四軍，但事實上達不到，因他發現日軍出動前，「新四軍」竟都能事先轉移，所以汪、日軍總是撲空，這點令他很納悶，其實唐有所保留，他應該知道是李士群的通風報信。見唐生明，〈我奉蔣介石命參加汪偽政權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總第40卷，頁20、26。

⁵⁵ 大風原作，李若松提供，《潘漢年促成李士群被日軍毒死》，《傳記文學》，第69卷第4期，民國85年10月號。頁87。作者爲當時軍統「上海區」人員，其說法來自當時曾與程克祥一同策反周佛海的彭壽。

⁵⁶ 尹騏，《潘漢年的情報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頁155~156。

⁵⁷ 吳基民原作，姚孔行提供，〈引潘漢年見汪精衛的胡鈞鶴〉，《傳記文學》，第67卷第1期，民國84年7月號，頁111。

群告訴潘漢年汪精衛心情不好想見見潘漢年。潘由李陪同去見汪，汪勸告潘：「過去我是主張聯共的，後來發生誤會了，你們和蔣介石聯合是沒有搞頭的。蔣是獨裁的，我是要搞民主的，我要搞議會政治，成立聯合政府，吸收各黨派參加，也請共產黨參加。」潘告以延安不可能會參加，但可以將汪之意見轉達給延安，最後潘還告訴汪：「如果將來你感到與日本人合作有困難，要另找出路時，新四軍不會對你過不去的，會給你一個轉身的餘地」⁵⁸。此時的汪精衛竟然想和他的死敵中共合作，他的國旗上端還附著「和平、反共、救國」的黃色飄帶，這完全違反其意識形態，然而為何汪精衛會有這個想法呢？

如果分析一下當時形勢就可以理解了。民國三十二年間日軍在太平洋軍事上已漸趨劣勢，且日本急於和重慶和談，以拔出陷在中國戰場泥潭中的日軍，而汪政權內部周佛海、陳公博等都已和重慶取得聯絡並私設電台，他們都在找退路，萬一日本真的失敗，在如此形勢下汪精衛將何去何從？如果日本及周佛海都走「重慶路線」，汪又絕無可能得到重慶諒解，那何不試試「中共路線」？於是可以這樣說汪政權在末期爲了出路問題幾乎形成兩大勢力，也就是「館外派」的周佛海走「重慶路線」，「公館派」的李士群走「中共路線」，但汪精衛應該不致於想要投靠中共，因事實上也很難成功，而聯合中共及利用中共才是比較有可能，但李士群就不同了，他是極可能與其清鄉部隊一同帶槍投靠的。曾爲李士群好友的胡蘭成曾說：「李士群若不死，抗戰勝利時他必不束手就縛，卻將帶了他的部屬投降共產黨。單他這個人，就與後來我所見初期解放軍的將領十分相像，他的雜牌隊伍十萬人，雖然亂七八糟，亦還比任何正規兵更宜於一旦轉化為初期人民解放軍。」⁵⁹。

李士群帶潘漢年見了汪精衛以後⁶⁰，回到上海李告訴潘其實汪、日最近並無對蘇北、淮南地區有掃蕩計劃，後來李又介紹潘見了日本華中派遣軍謀略課長都

⁵⁸ 尹騏，《潘漢年的情報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頁158~161。本書作者認爲汪因日本急於和重慶和談竟讓周佛海和重慶搞「熱線」而感處境不妙，故讓李士群聯絡中共，是想藉此向日本展示他的政治能量，增強日本對他的信心，並加深重慶與延安的摩擦，這個說法頗有見解。

⁵⁹ 胡蘭成，《今生今世(上)》，（台北：遠流出版社，民國79年9月16日初版一刷），頁253。

⁶⁰ 潘漢年戰後因其與汪精衛見面及受饒漱石、楊凡案牽連，於民國四十四年被控以「內奸」及「反革命」罪名判處十五年徒刑，毛澤東且親自點名批判。民國五十二年假釋，文革爆發後，民國五十六年再被關押，並永遠開除黨籍、改判無期徒刑。當時潘已得肝癌然仍遭不人道之審訊，民國六十四年潘夫婦下放湖南勞改營，民國六十六年因病重含冤去世。潘的坐獄咸認是一場「政治冤案」，一個爲黨賣命大半生的情報首領竟遭此下場不禁令人歎歎。文光，〈潘漢年冤案的前前後後〉收在中共上海市黨委史研室編，《潘漢年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頁414~420。

甲大佐，都甲提到「新四軍」若不破壞津浦線南段鐵路運輸安全，日軍極願和「新四軍」有一緩衝地帶⁶¹。潘離開上海後不久，李士群尚曾至揚州與中共代表會面。據陳恭澍的說法，民國三十二年五、六月間當時身兼江蘇省主席的李士群帶著其省府人員及陳恭澍、唐生明等人視察揚州，李竟趁大家酒酣耳熱之際至仙女廟與「新四軍」人員會談。陳恭澍於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任軍統上海區長，三十年十月上海區被破獲陳恭澍被捕，隨即投入李士群手下。

陳猜測雙方之會談內容應該和李士群今後的動向有關，適於此時與陳恭澍一同被捕的上海區書記齊慶斌已背著汪日和重慶重新取得聯繫，有電台直通，陳乃將李士群通共的消息告訴齊慶斌，請其通知重慶。後來陳恭澍、唐生明曾與李士群談江蘇省保安部隊擴編之事，李士群不主張把訓練基地設於蘇州，而堅持一定要擺在江北對岸的鎮江，陳推測這個措置可能是要與江北的「新四軍」相呼應⁶²。

李士群是「七十六號」的負責人，軍委會調統部部長，但與中共聯繫，擬打通「中共路線」者並不只有他，其手下的兩位大將胡鈞鶴及傅也文也都有與中共暗通的記錄，胡甚至擔任李、潘間的聯絡人，所以李的手下與中共的聯繫，可能皆出於李士群的示意與默許，民國三十八年上海陷共後胡鈞鶴被委任為上海市公安局社會處情報委員會主任，為中共於上海從事肅清國民黨地下工作人員的情報工作，曾幫助中共破獲四百多名潛伏於上海的國民黨特務⁶³。由此可見其與中共非凡的關係。除了胡鈞鶴之外，「特工總部」書記長傅也文也曾於浙江與共軍代表私會，民國三十一年夏天，已投奔李士群手下的陳恭澍獲得自由後被委為「蘇浙皖贛四省行營總指揮部—前進指揮部」指揮官，與當時被任為總指揮的傅也文準備帶隊由杭州前往金華，因當時日軍即將攻下浙江之金華，為了安定新佔領區，防重慶的反攻及「土共」的侵入，須於金華設一「蘇浙皖贛四省行營總指揮部—前進指揮部」，其任務是收容散兵游勇、撫輯流亡百姓、恢復社會秩序、壯大本身武裝。這次的行程又讓陳有一個意外發現，即傅也文竟以省親為名回老家東陽縣與浙江的中共人員會面⁶⁴。陳恭澍認為傅的私通共產黨，李士群夫婦應該知道⁶⁵，而當傅在金華準備返鄉前曾召當時在杭州的副總指揮謝文潮至金華代理

⁶¹ 尹騏，《潘漢年的情報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頁161~162。

⁶² 陳恭澍，《抗戰後期反間活動》，(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75年7月31日初版)，頁355~365。

⁶³ 吳基民原作，姚孔行提供，〈引潘漢年見汪精衛的胡鈞鶴〉，《傳記文學》，第67卷第1期，民國84年7月號，頁112。然而胡鈞鶴也沒能逃過中共的整肅，民國四十三年胡鈞鶴因其「漢奸」過往被中共當局關押，民國七十三年獲平反，民國八十二年去世。

⁶⁴ 陳恭澍，《抗戰後期反間活動》，(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75年7月31日初版)，頁288、294。

⁶⁵ 吳開先也持同樣意見，吳稱：「余被捕後，汪精衛、傅也文必欲置余於死地，因傅係共黨重要

其職務，謝文潮是一名老共產黨員，且為李士群妹夫，故陳恭澍又推測李士群、謝文潮、傅也文之間的關係不大尋常，在與中共的關係上應該是同夥⁶⁶。

由以上的資料綜合研判，民國三十一年及三十二年間，汪政權內李士群系的「特工總部」已很大程度被中共所影響滲透，陳恭澍被捕後正於此期間投入「七十六號」李士群的手下，當時正是李勢力如日中天之時，也是李士群與中共聯絡最密切的一段時間，陳恭澍直言：

「七十六號」殺人是不眨眼的，他們是一夥漢奸、強盜、流氓以及共黨份子混合組成的罪惡集團⁶⁷，又說：以往人們都以為「七十六號」只不過是一個罪惡的淵藪而已，但很少人瞭解，它還在暗中掩護共產黨的地下活動，並協助共黨份子直接、間接的打擊我政府工作人員⁶⁸。

陳身歷其境才能總結這樣的看法。中日戰爭的形勢對日本愈形不利，戰後汪政權及其幾十萬所謂「偽軍」的動向將對國共戰後在江南勢力消長造成絕對影響，是故國共都暗中極力拉攏汪政府要員，抗戰期間潘漢年曾用不同身份、不同方式接近汪政府高層，如陳公博、周佛海、羅君強、李士群等⁶⁹。中共也曾數次派人說服周佛海投共，例如民國三十年中共曾由「新四軍」方面派出周佛海之妻楊淑慧妹妹楊淑宇至南京策反周佛海，民國三十二年春「新四軍」再派出馮少白至上海與周佛海聯絡⁷⁰，中共並曾餌周佛海以「東南民主聯軍總司令」職，企圖於戰後控制京滬，但因戴笠已著先鞭而失敗⁷¹。雖然中共策反不成周佛海但卻成功拉攏到李士群，李士群乃走上了不同於周佛海的「中共路線」。如果陳恭澍所提供的資料不假，李士群最後甚至想擴充江蘇保安部隊並且將其佈置於江北，試圖與「新四軍」呼應。而他又派「特工總部」書記長傅也文在浙江省佈置，想成立一個特別行政區，這樣的安置再配合「新四軍」游擊隊，將對京滬區造成包圍

份子，為李士群所吸收，置在『七十六號』任機要秘書」。見吳開先，〈滬上往事細說從頭一讀汪曼雲等『捉放吳開先』一文不得不寫的一段回憶〉，《傳記文學》，第 51 卷第 6 期，民國 76 年 12 月號，頁 31。

⁶⁶ 陳恭澍，《抗戰後期反間活動》，(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5 年 7 月 31 日初版)，頁 321~332。

⁶⁷ 陳恭澍，《抗戰後期反間活動》，(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5 年 7 月 31 日初版)，頁 217。

⁶⁸ 陳恭澍，《抗戰後期反間活動》，(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5 年 7 月 31 日初版)，頁 309。

⁶⁹ 劉人壽、何萃，〈記潘漢年對敵隱蔽鬥爭工作片段〉收在中共上海市黨委史研室編，《潘漢年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 12 月第一版)，頁 165。

⁷⁰ 張宗高，〈抗戰時期中共對周佛海的策反揭密〉，《黨史文苑》，1997 年，第 5 期，頁 43~45。

有關中共派馮少白見周佛海，周佛海民國 32 年 3 月 8 日有如下記載：「六時，筱月帶馮龍(馮少白，新四軍司令部參謀處科長)來見，告以對外和平，對內統一之大義，並分析國際形勢，謂英美對蘇終不永久合作，日、蘇或有提攜以對付英、美之一日。談一小時！辭去。其意何在，殊難揣測，當一面與之周旋，一面監視其發展也。公博對此事亦頗注意，允與馮晤談。」。見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年)，頁 822。

⁷¹ 費雲文編纂，《戴雨農先生全集(下)》(台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 68 年 10 月)，頁 957。

態勢，應是中共佈置戰後奪取江南的計劃之一。站在李士群方面而言，萬一汪日失敗，李就可以帶著新擴充的江蘇保安部隊，投奔蘇北「新四軍」。

三、剷除禍根、假手汪日

李士群原為「中統」中無足輕重的人物，當初李進入「中統」乃由丁默邨所介紹，且竟是充任中共內線。「七七事變」爆發南京淪陷後，李士群輾轉至上海，「中統」上海人員發現其行為有異，曾謀就地制裁未果⁷²。故對於李士群重慶早欲除之而後快，尤其李士群後來加入汪政府成為「七十六號」領導者，對於上海淪方地下組織危害甚大。「中統」清除門戶之舉既無法成功，民國二十八年九月「軍統」上海區行動三隊隊長李楚琛奉命制裁丁默邨、李士群，結果為其眼線出賣被捕槍決。同年十一月，「軍統」上海區情五組組員陳兆慶在兆豐花園制裁李士群未成被捕，刑訊不屈，釋放後重傷身死⁷³。民國三十年四月戴笠再鑒於李士群「阻撓中央在陷區實施之各種政策，凡足以獻媚日敵者，無所不用其極。另在杭州設無線電台，專偵察我軍事行動，並派情報人員潛赴後方，探取情報，以供敵用，實為抗戰以來罪大惡級之巨奸」⁷⁴，於是戴再找到韓籍志士崔博學與崔之友人黃永哲去行刺李士群，但二人皆失敗且反被槍殺。「中統」及「軍統」多次的行刺不僅未能成功且導致李士群此後的防範更嚴⁷⁵。在多次暗殺李士群都不成功後，「軍統」改以招安方式，派人策反李士群。

民國二十九年七、八月間蔣中正及戴笠派唐生智之弟唐生明赴南京入汪政權充內線，臨行前戴笠要唐生明「注意和汪偽特工總部負責人李士群要拉攏好，通過這個人和這個組織，就可以使大後方和淪陷區的特務工作連成一片。」⁷⁶結果唐僅成功打入汪政府成為李士群手下，但卻始終無法成功策反李士群。於是戴笠又派出了余祥琴。先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戴笠派「軍統」人員劉戈青攜戴之親筆信至上海，擬說服已投汪的原「軍統」上海區長王天木⁷⁷等一同制裁汪精衛，結果劉被誘捕，關押「七十六號」，劉戈青是槍殺故維新政府外交部長陳籙主嫌，

⁷²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驊檔案》，第六十一函：上海黨務(七)京滬附逆一黨員附逆名單，朱家驊回報總裁有關上海之調查。

⁷³ 〈大陸呈蔣中正軍統殉職者名單〉國史館特交檔案 軍事：特種情報 檔號 080102 第 034 卷 光碟編號 08A-00493(002-080102-034-001)

⁷⁴ 費雲文編纂，《戴雨農先生全集(下)》(台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 68 年 10 月)，頁 780。

⁷⁵ 費雲文編纂，《戴雨農先生全集(下)》(台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 68 年 10 月)，頁 781~782。

⁷⁶ 唐生明，〈我奉蔣介石命參加汪偽政權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 年)，總第 40 卷，頁 11。

⁷⁷ 王天木，吉林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加入「軍統」後擔任「天津區」區長，抗戰後改任「上海區」區長。國史館特交檔案，軍事：特種情報，檔號 080102，第 034 卷，光碟編號 08A-00492(002-080102-034-001)。

日軍欲引渡劉戈青⁷⁸，但卻被李士群拒絕，李稱劉有利用價值將其關押「七十六號」，但頗優待之，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劉戈青逃出上海「七十六號」，輾轉經香港抵達重慶，戴笠非常高興並於歡迎大會中對劉戈青稱許不已。戴笠推測此時是利用李士群的大好時機，於是在吳開先及杜月笙推薦下決定派余祥琴至上海策反李士群，余祥琴戰前於上海執業律師，曾為李士群打贏官司，與李士群為舊好。民國三十年八月三十日，余祥琴奉召飛渝，余見戴後發現戴對李士群未將劉戈青引渡給日本一節頗為感動，並對余喃喃自語曰：

總等機會用他一次 我要你同李士群講，現在是他一個機會，就把汪逆精衛殺了，我們會集中力量響應他安全撤退，或者乘汪精衛到達蘇州李之勢力範圍內劫持汪逆來歸，我向委員長保證給他更好的地位，否則由他協助我們同志完成制裁汪逆工作，我發給獎金三百萬，參加行動諸同志再保證出國深造⁷⁹。

民國三十年九月十一日余抵達上海，隨即與軍統上海區書記齊慶斌取得聯繫（當時區長為陳恭澍），九月二十一日再透過吳四寶的聯繫，余祥琴在李寓所見到李士群，並傳達戴笠感動其不殺劉戈青及希望暗殺汪精衛的話，李稱在道義上對汪下不了手，不料十月九日余已聯絡不到「上海區」，原來上海區已被李士群破獲，區長陳恭澍及區書記齊慶斌等皆被捕。上海區被破獲後余祥琴即奉召回渝，余回渝後見到戴笠，余告戴謂李士群得汪精衛更強力之支持，地位穩固，情況有變，策反工作失敗。戴則說：「就在這幾天上海區被捕同志將被殺，此仇非報不可。」言時還熱淚盈眶⁸⁰。由余祥琴的記述可知，戴笠本來還對李士群抱著希望，甚至因其未殺劉戈青而被他所感動，但派人策反的結果卻是李士群破壞「軍統」最大外勤組織上海區，捕殺軍統人員，於是戴笠含淚揚言報仇。

民國三十年秋天，國民黨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結束其返渝述職之行，由渝經香港準備回到上海，繼續領導與汪日對抗的地下工作，由於每次吳開先經過香港都由杜月笙安排回上海路線及接應人員，此次亦不例外，但這次杜月笙透露給吳開先一個天大的情報，杜告吳說：

⁷⁸ 劉戈青是一傳奇人物，台灣籍。有關其事蹟，參見喬家才，〈虎穴游龍劉戈青〉收在《浩然集(2)－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1)》，(台北:中外圖書出版社，民國70年10月初版)，頁1~37。

⁷⁹ 見余祥琴遺著，閔夢塵編校，〈上海淪陷期間四年地下工作追記(上)〉，《傳記文學》，第33卷第2期，民國67年8月號，頁46~47。余所記「上海區」被毀日期有誤，按陳恭澍本人及周佛海日記之說法「上海區」是十月二十九日遭破壞。

⁸⁰ 見余祥琴遺著，閔夢塵編校，〈上海淪陷期間四年地下工作追記(中)〉，《傳記文學》，第33卷第3期，民國69年9月號，頁84~85。

頃得確報，知共產黨徒潘漢年，已與偽特工負責人李士群取得聯絡，相互協助，並聞潘漢年在滬，即住李士群之私寓，勢必互為利用，予兄等以打擊，我兄此去，風險更大，而敵人亦多。但願吉人天相，如有緩急，當盡力幫助，赴滬請與徐采丞先生多多接洽⁸¹。

杜的消息應來自於其上海的「恆社」人員⁸²，杜月笙當時為免日軍脅迫，雖已移居香港，但其於上海的幫會勢力仍然很大⁸³。若綜合前文所提戴笠於民國三十年九月間曾派余祥琴至上海策反李士群，而杜月笙也於民國三十年秋間得到李士群暗藏潘漢年的消息，兩者時間相近，而戴笠安置潛伏在周佛海身邊的程克祥此時也已成功策反周佛海，程克祥於民國三十年九月帶著周的口信啓程回滬⁸⁴。這些都發生在民國三十年的八、九月間，或許可以這樣推測，由於日軍遲遲無法擊垮重慶政府，連周佛海及李士群等人都不得不另開闢一條路，而重慶及延安都嗅到這樣的訊息，於是重慶說服了周佛海，但李士群卻被中共拉走了。

在重慶這方面說其由陳恭澍、唐生明、杜月笙的情報可以很輕易得知李士群投向中共的訊息，其實重慶也確實一直密切注意李之動向。民國三十年八月，汪政府改組，李士群的警政部長一職，被周佛海商通影佐建議汪精衛把他撤銷了，李大鬧情緒⁸⁵，中統人員曾向重慶回報：「一、偽組織中之周逆佛海陳逆公博梅逆思平，以李逆士群大權獨攬，心頗忌恨，久懷倒李之念，此次偽政府改組，周梅陳三逆趁李逆士群在蘇之際，聯合報告汪逆，擬定將偽警政部取消，在偽內政部設一警政總署。」⁸⁶可見李士群在汪政權內部正陷入危機，對於李士群實力將被削弱，同一時間戴笠曾向蔣中正分析此事並提出了：「敵方洞悉李逆士群過去曾為共黨，其部下又多為共黨之轉變份子，敵方復恐一旦李逆與共黨恢復關係，不得不具戒心也。」戴笠並報告蔣其已急電滬區速行查明李士群在蘇州最近動態並作種種策動⁸⁷，戴笠也在同一時間注意到李士群的中共關係絕對有其情報意義

⁸¹ 吳開先，〈抗戰期中我所見到的杜月笙先生〉收在 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二十六輯—杜月笙先生紀念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 65 年 2 月影印版)，頁 39。按吳、杜當時同為「上海統一委員會」常務委員，杜月笙協助吳開先統一指揮上海之地下工作。

⁸² 「恆社」是杜月笙所招收的學生組織，各階層人士都有，曾協助國民黨在上海的清黨，抗戰後杜月笙離滬赴港，「恆社」及其親信萬墨林等留滬掩護滬方地下工作人員。參見郭蘭馨，〈杜月笙與恆社〉，《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舊上海的幫會》，第 54 輯。頁 301~319。

⁸³ 章君毅著，陸京士校訂，《杜月笙傳(四)》(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91 年 11 月 1 日第三版)，頁 178。

⁸⁴ 程克祥口述，黃曜隆編著，《京滬區長》，(中壢:慈恩書局，民國 71 年 6 月初版)，頁 68~73。

⁸⁵ 羅君強，〈細說汪偽(中)〉，《傳記文學》，第 26 卷第 2 期，民國 82 年 2 月號，頁 85。

⁸⁶ 關鎮上海 30 年 8 月 17 日電：汪逆偽府改組李逆士群之動態。國史館 抗戰史料 檔號 0160.52 1833.66.-03 微卷號 26 頁 1891。

⁸⁷ 〈戴笠對汪偽改組之分析與建議呈蔣委員長報告—民國 30 年 8 月 21 日〉 收在 中國國民黨中

的，這個報告也間接暴露出戴笠對李士群聯絡中共的憂心。

於是重慶爲了斬斷李士群的「中共路線」，十天後就派余祥琴至上海策反李士群，但是李士群不僅拒絕戴笠所提暗殺汪精衛的要求，還在同年十月徹底破壞了「軍統」上海區，區長陳恭澍及區書記齊慶斌都被捕，余離開上海後，李士群的「特工總部」還在同年(三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將已被捕的「軍統」南京區長錢新民槍斃於上海西郊，隔年三十一年一月十九日索性再把關押中的南京區副區長尙振聲及「第三戰區駐滬代表」平祖仁押往刑場槍斃⁸⁸，適於此時策反周佛海成功，回到重慶傳達訊息的程克祥曾向戴笠報告此事，戴笠聽完後熱淚盈眶⁸⁹。相信李士群的行爲足讓重慶徹底絕望。民國三十一年一月陳立夫透過趙冰谷收到了丁默邨的悔過書，丁要向重慶自首，陳立夫即透過趙冰谷告訴丁默邨請其破壞「七十六號」及剷除李士群⁹⁰。所以從民國三十一年起，似乎「軍統」與「中統」皆對李士群下達制裁命令，這個時間點和三十年底李的通共很接近，這極有可能是重慶各方協議的一致行動。

民國三十二年二月間程克祥由重慶帶著電台回到上海，爲軍統成功策反周佛海。從此周佛海及其妻弟楊惺華、羅君強等皆透過程克祥的電台與戴笠聯繫⁹¹。周佛海與戴笠取得聯絡並向重慶輸誠後，民國三十二年春戴笠給程克祥一個密電⁹²，內容爲：「李逆士群甘助日寇為虐，迭次殘害我地下工作人員，近日又聞與中共奸黨相勾結。此賊對我方危害甚大，即著與周佛海、羅君強諸兄等籌商制裁辦法，迅即回報。」⁹³此後周佛海與羅君強、熊劍東常密商除李辦法⁹⁴。然而到了六月周佛海還想挽回李士群，對他進行道德勸說，周佛海曾在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六日的日記中寫下這樣的話：「與李(李士群)談二小時，勸其事業應循正軌，惟此

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六編 傀儡組織(三)》(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 70 年)，頁 232~233。

⁸⁸ 陳恭澍，《抗戰後期反間活動》，(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5 年 7 月 31 日初版)，頁 102~103。按陳恭澍當時亦被關押於「七十六號」，聽到南京區長被槍殺，不禁興起兔死狐悲之感，頗爲耽心自己處境。

⁸⁹ 程克祥口述，黃曜隆編著，《京滬區長》，(中壢：慈恩書局，民國 71 年 6 月初版)，頁 84~85。

⁹⁰ 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2)—陳立夫秘書室致薛誦齊函(1946 年 11 月 17 日)》，(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 7 月第一版) 頁 812~813。

⁹¹ 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1)—軍統爲證明周佛海協助工作致趙琛電(1946 年 10 月 30 日)》，(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 7 月第一版) 頁 186。

⁹² 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1)—首都高等法院檢察官訊問筆錄(1946 年 9 月 24 日)》，(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 7 月第一版) 頁 130。

⁹³ 楊碧川，《國共諜報》，(台北：一橋出版社，2000 年 7 月初版一刷)，頁 132。

⁹⁴ 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2)—首都高等法院審訊筆錄(1946 年 10 月 23 日)》，(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 7 月第一版) 頁 925。

人誠意缺乏，恐終無效也。」⁹⁵周佛海認為李士群事業「不循正軌」?應該是指其與中共聯絡之事。

熊劍東是胡蘭成的兒時好友，前文已有交代，抗戰後熊劍東參加戴笠組織之「忠義救國軍」，在江蘇常熟、太倉、昆山、蘇州一帶打游擊⁹⁶，民國二十八年因至上海開軍事會議被日本憲兵所捕⁹⁷，監禁年餘被釋放後投汪，民國二十九年熊被送至日本東京等地遊覽⁹⁸，由於熊劍東未投汪前曾至太湖招收舊部，被李士群叫日軍攔擊，與李士群有宿怨。熊回國後經好友胡蘭成介紹充任周佛海稅警總團副團長，熊劍東遂與羅君強並兼成了周佛海手下兩員大將⁹⁹。熊因行伍出身，能征慣戰，與日本憲兵及部隊的關係漸漸勝過李士群，以此李也必要鬥倒他，兩人至最後互欲行刺。

熊劍東也多次與胡蘭成討論除李辦法，胡教之先斷李士群與日人的關係，再請陳公博或周佛海邀李士群吃飯於席間殺之，熊商之於周佛海及陳公博，陳周二人均不敢為。於是胡蘭成再建議熊劍東去跟日本憲兵商量，因胡已獲秘密消息，日本政府已命上海憲兵隊處置李士群¹⁰⁰。熊果真尋求日憲兵隊協助，兩個月後，熊告訴胡：「東京方面的覆示已到，李事現地善處，惟須避免引致嚴重後果。」原來日人亦欲除掉李士群，但日人頗擔心汪精衛的反應，因汪精衛很支持李士群。胡蘭成告訴熊劍東等人以其對汪的瞭解，汪不會因李士群之死而反彈，五、六天後胡蘭成即聽說李士群之死訊¹⁰¹。日本人為何也同意殺掉李士群呢？按戰後曾任汪政權物資審議委員會秘書長的袁愈佳的說法，民國三十一年日本決定實行強化南京政府的方針，目的為整飭日軍內部，並拉攏中國資本家。首相東條英機派出他的親信、日本參謀本部參謀辻政信大佐至南京任日本派遣軍總司令部第四科科長執行該任務。按袁愈佳的說法民國三十二年九月李士群被毒死乃辻政信所精心策劃¹⁰²。辻政信親口告訴袁李士群是汪政權的一個「惡性腫瘤」。袁在回憶

⁹⁵ 蔡德金編著，《周佛海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 869。

⁹⁶ 黃美真、姜義華、石源華《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頁 158。

⁹⁷ 按熊劍東於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六日被日憲兵逮捕。見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2)－熊唐君毅致薛誦齊函(1946年12月四日)》，（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版）頁 831，唐君毅為熊劍東之妻，當函是替丁默邨作證之口供。

⁹⁸ 劉建新，〈我所知道的黃衛軍〉收在黃美真編，《偽廷幽影錄－對汪偽政權的回憶紀實》，（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頁 270。作者曾任「黃衛軍」的政訓工作。

⁹⁹ 有一說，熊原奉戴笠之命在上海近郊從事游擊，被俘之後奉准打入偽組織，與另一受命深入反間的李果謀共組「黃衛軍」，自任總司令。見良雄，《戴笠傳(下)》，（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9 年 7 月 30 日），頁 330。此說若真，則熊之加入汪政權早經重慶授命。

¹⁰⁰ 萬墨林，《滬上往事(3)》，（台北：中外圖書出版社，民國 63 年 5 月初版），頁 526。

¹⁰¹ 胡蘭成，《今生今世(上)》，（台北：遠流出版社，民國 79 年 9 月 16 日初版一刷），頁 253。

¹⁰² 袁愈佳，〈毒死漢奸特務頭子借以籠絡人心〉收在黃美真編，《偽廷幽影錄－對汪偽政權的回

文章中尚提到周佛海還會向他透露東條首相親自命令辻政信來替汪政權動手術，割掉李士群這個毒瘤¹⁰³。

若再參考曾任「梅機關」負責人，汪政權軍事顧問團顧問，實際支持催生「七十六號」的晴氣慶胤的說法，李士群因清鄉的問題，與周佛海的關係更尖銳對立，李兼任江蘇省主席後，江蘇儼然成一獨立王國，行政院失去對江蘇省之統治權，再者日本「興亞院」華中聯絡部及上海市政府中的日華官員認為清鄉地區的物資統制，使上海糧食不足，米價爆漲，上海有發生米糧爆動的危險，然而李士群卻堅不調整物資統制政策，而汪政府之中舊維新政府「綏靖軍」因清鄉工作的推展而失去其駐守之地盤，且清鄉委員會還要調他們與重慶軍隊作戰，這會減損他們的實力。再者原江蘇省政府官員及安徽、浙江省政府官員都因清鄉的擴展而惴惴不安，因清鄉將成立辦事處，辦事處將攘奪所有行政權，失業的危機讓他們群起反對清鄉，於是周佛海挾著新仇與舊恨，糾合一派官僚軍人反對清鄉，主張撤銷或改革「清鄉委員會」，李士群只得到汪精衛及軍事顧問部的支持，寡不敵眾，漸漸陷入四面楚歌的包圍之中，而李士群最有力的日本後台晴氣慶胤中佐於民國三十一年四月，突然奉命調任華北方面軍參謀，六月李的另一日人支持者汪政權「最高軍事顧問」影佐禎昭也被調至滿洲，於是沒多久「清鄉委員會」即被撤銷¹⁰⁴。

值得注意的是在晴氣的書中曾提到，李士群最後會被毒殺尚有一個原因即是「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情報課也與李士群敵對，當時的情報課長為川本芳太郎大佐，他努力搜集重慶的政治情報，晴氣且赫然指出川本的情報來源即為吳開先，吳開先為「國民黨組織部副部長」，為重慶派在上海的地下工作領導人，吳感到自身處境的危險，就以提供重慶的政治情報為代價，秘密接受川本大佐的保護，民國三十一年三月，李士群將吳開先逮捕，當時川本剛由漢口回來，在機場上氣得火冒三丈，並馬上提出抗議，說是逮捕吳開先影響日軍所採取的措施，川本甚至以「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名義請影佐放了吳開先，「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失去了吳開先這一條情報路線，因此深恨李士群¹⁰⁵。

但事實上日人要殺李恐怕有更大原因，陳恭澍曾在其書中指出原因即是日人發現其向中共靠攏，陳提到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的情報課突然接獲一份

憶紀實》，(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頁173~174。

¹⁰³ 袁愈佳，〈毒死漢奸特務頭子借以籠絡人心〉收在黃美真編，《偽廷幽影錄—對汪偽政權的回憶紀實》，(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頁176~177。

¹⁰⁴ 晴氣慶胤，《上海テロ工作七十六號》，(東京：每日新聞社，昭和55年)，頁210~216。

¹⁰⁵ 晴氣慶胤，《上海テロ工作七十六號》，(東京：每日新聞社，昭和55年)，頁194。

機密情報，情報內容是李士群立場不穩，陳並分析這個「不穩」的情報應是指著李士群與中共的勾搭，而且認為提供情報的應是重慶的地下工作人員¹⁰⁶，陳的說法可能正確，因為有證據顯示戴笠在給周佛海下制裁令的同時還擬定了一個「除李計劃」，該計劃內容就是要在日汪間行反間計，由軍統潛伏在周佛海身邊的彭壽等人交給周佛海有關李士群與「新四軍」暗通的資料，再由周將該資料交給日方，該資料的內容包括李士群當上江蘇省長以後，讓中共上海特工負責人潘漢年住在蘇州「拙政園」裡，該資料還附上潘漢年、黃敬齋(李士群系國民新聞社負責人)、胡鈞鶴三人合照之照片，以及一份李士群、潘漢年所擬定的「接引新四軍渡江計劃」，原來「新四軍」打算渡江攻打京滬，在李士群部隊的接應下切斷日軍的供應和退路，若不成功就撤走打游擊，雖失敗亦可獲得國際上之宣傳，對中共有利無害，日方從周佛海手中拿到這份資料，立即決定除掉李士群，並且與周佛海等人商量解決李士群的方案¹⁰⁷。所以陳恭澍所稱川本芳太郎接獲李士群不穩的情報，或許是指著周佛海所交給日方的這份資料而言，故日方要殺李士群除了前述幾個遠因之外，重慶的這招借刀殺人之計應該才是關鍵。

四、疑點重重、死因釐清

綜合以上各種證據，於是可以得到李士群死因的大致輪廓，在汪政權內部方面，李士群與丁默邨、周佛海等人因權力鬥爭關係惡化，而李的清鄉再與汪政權維新派、地方政府人員等發生利益糾葛，而在日本人的立場，日人原是信任李士群的，但李士群的「特工總部」雖對重慶地下工作予以重創，其綁架富商等不法行為卻也使上海中國資本家人深惡痛絕，而太平洋戰爭發生後，日本急欲上海中日資本家合作以搜刮更多物資，於是資本家們的意見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視。除此之外，日軍再由周佛海處接獲李士群立場不穩且與「新四軍」暗通要攻打京滬的消息，對於李士群這種吃裡扒外、引狼入室的投機作為，日方無法再坐視，遂決定除掉李士群，但是鑑於李士群是汪政權一大支柱，並深獲汪精衛信任，為慎重起見於是日本首相東條英機派出辻政信至上海來割除汪政權的這個毒瘤。

在重慶方面，幹掉李士群一直是他們的目標，但「中統」及「軍統」多次失手後，戴笠改採柔性攻勢，於二十九年及三十年分別派出唐生明及余祥琴至上海策反李士群，但都不成功¹⁰⁸，李士群先是收服「軍統」上海區區長陳恭澍，再將

¹⁰⁶ 陳恭澍，《抗戰後期反間活動》，(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5 年 7 月 31 日初版)，頁 370。

¹⁰⁷ 大風原作，李若松提供，《潘漢年促成李士群被日軍毒死》，《傳記文學》，第 69 卷第 4 期，民國 85 年 10 月號，頁，87~88。李士群死後隔天，該資料曾由彭壽拿給作者看過，彭壽還告訴作者，李士群的死是「老闆」的高招。(老闆是軍統人員稱戴笠)。

¹⁰⁸ 唐生明在其回憶文章中提到：「我爭取李士群花了幾年功夫而無結果，到了民國三十二年夏

關押於「七十六號」的原「軍統」南京區長及副區長槍斃，最嚴重的是李士群還掩護「新四軍」，供應「新四軍」物資乃至於佈置軍隊準備呼應共軍奪取江南，戴笠得到這個消息後不得不採斷然處置，乃對周佛海及唐生明下了制裁李士群的命令，同時並透過周佛海向日方提供李士群與「新四軍」準備攻擊京滬區及日軍的計劃，重慶的「反間計」奏效，日方極為震怒，而李士群在汪政權內部又結了不少死敵，正陷於四面楚歌之境，於是竟由重慶下令，透過汪日之手殺掉了李士群。重慶的特工傑作寧不令人嘆為觀止？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了，據說李士群聽到這個訊息極度震驚，一聽到日本已對美國宣戰，連忙趕到晴氣慶胤處求證，我們由晴氣的回憶錄來看李士群對日美開戰是多麼「痛心」，回憶錄中說李面頰漲得滿臉通紅，上氣不接下氣，眼睛佈滿血絲，激動得雙手微微發抖，好不容易勉強控制內心的激動後告訴晴氣：「東條先生開始幹蠢事啦！」李士群說他想向日本提出抗議，認為今天在中國的戰爭尚無解決的希望，為什麼要主動同擁有強大國力的美國進行戰爭呢？李知日美開戰是無可改變的事實後，臉上露出淒涼的微笑，然後說了一些日汪互相合作的話後，當場癱倒在腳邊的椅子上，陷入了沉思¹⁰⁹。可見李士群顯然對日美開戰的結局不看好，他在沉思什麼呢？應該是為他今後的命運擔心吧，就在同一個時間點，民國三十一年初李與潘漢年會面，他是在為戰後尋求活路，而其之所以不尋求重慶路線，乃因身上背著太多重慶地下工作人員的血債，是絕無可能得到重慶的諒解的¹¹⁰。

然而日本方面除掉李士群的動機尚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事實上晴氣一書中對李士群的清鄉及特務工作是讚賞有加的，李也一直得到影佐及汪精衛的支持，若說日方因為李士群得罪中日資本家以及其他經濟因素而動殺機理由實在牽強（這是大多數大陸學者的觀點），在汪政權內部搜刮貪污的人又何止李士群，且以李在汪政權的地位，殺掉他是會撼動整個汪政權的，這是何以岡村與熊劍東商量殺李對策時，深怕殺李後汪精衛的反應，李士群是不能隨便殺的，這也是為何要由東京方面親自批示派人執行的原因了，所以經濟方面的因素而要殺李的理由會不會太過薄弱？因此一定還有其他日方覺得非殺不可的原因，那就是前述軍統人

天，重慶才下決心除掉他。」唐生明，〈我奉蔣介石命參加汪偽政權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總第40卷，頁65。

¹⁰⁹ 晴氣慶胤，《上海テロ工作七十六號》，（東京：每日新聞社，昭和55年），頁208~209。

¹¹⁰ 唐生明，〈我奉蔣介石命參加汪偽政權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總第40卷，頁64。唐稱其幾年來曾多次側面聽過李士群為何不和重慶合作的理由，李認為他殺了太多「軍統」及「中統」人員，與重慶的仇結得太深。

員的說法，重慶向日本揭露的李士群與中共的關係，然而這種說法又產生一個問題，那即是李士群與中共的接觸影佐是完完全全知道的，前文已述及潘漢年是得到影佐的同意才見到李士群的，再者潘漢年與岩井英一的情報關係緊密，岩井及日本駐香港領事館還曾幫助中共駐香港的地下工作人員撤退，因此日方對李士群與中共的聯絡應該是很清楚的，可能以前不殺李的原因應該是認為那只是「情報交換」，只是日汪和中共的情報人員互相利用，本來情報人員其關係必須有靈活性才容易施展工作，前面曾提到吳開先都與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有聯繫了，李與中共的關係日方應該也能在這個角度理解，然而當重慶透過周佛海交給「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的川本芳太郎，有關李士群與「新四軍」密謀攻打京滬的計劃後，日方對李士群的忠誠度起了懷疑，李士群與中共的關係已不僅止於情報交換了，這點令日人心驚！

但是另有一問題即是日方憑什麼那麼容易相信重慶的資料？尤其川本芳太郎是完全知道周佛海與重慶的暗通，當他接到周佛海這個訊息時難道沒有懷疑是重慶的「反間計」？然而假如是日方因某種目的而「故意相信」或「不得不相信」那就另當別論了，民國三十二年九月李士群死亡的當時日本正急於與重慶和談，這會不會是重慶對日和談謀略的一個條件¹¹¹，否則為何日方特地由首相派人到上海來執行，若回頭再參考晴氣的說法，「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與李士群立場迥異？因為吳開先是受「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保護的，而李士群竟將之捕捉，日軍的立場怎麼這樣矛盾，吳開先是重慶的人員啊？是日軍的敵人啊！唯一的解釋會不會是李士群把日本政府和重慶聯絡的管道摧毀而讓日本政府光火，因為當時日本政府正急於與重慶和談啊¹¹²，晴氣的用語很值得玩味，「立場迥異」？李士群捕捉重慶人員怎麼能說是和「總軍」立場不同，會不會是在暗示李士群的「中共路線」和「總軍」的「重慶路線」不同，話再說回來，日方也早就知道周佛海和重慶的關係了，若非日方默許，周佛海能無事¹¹³？重點是重慶也和美軍準備在東南沿

¹¹¹ 參見黃國平，〈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是怎樣被毒殺的〉，《炎黃春秋》，1994年第11期，頁81。該文發表於大陸，黃提到：「太平洋戰爭末期，日本有意利用重慶政府之際，殺一個李士群以討好重慶政府是太簡單不過了。」

¹¹² 日本透過「總軍」急於尋找與重慶和談之管道至完全喪失立場之地步，民國三十一年冬唐生明於汪政府臥底的身份曝光，被帶到「總軍」後，「總軍」的都甲大佐等對唐非常客氣，還安慰唐不必害怕，且稱贊唐，都甲提到很高興能找到與蔣介石有關係的人商談，稱將盡力支持唐的工作，要唐將電台保留，由日軍保護，南京政府決不敢為難，一切由日軍作主。唐生明，〈我奉蔣介石命參加汪偽政權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總第40卷，頁43。

¹¹³ 民國三十二年春，程克祥等人準備為周佛海與重慶的聯絡架設電台，竟由周佛海向日本「總軍」的情報課長川本芳太郎大佐得到一張證明書，受到川本保護。見羅君強，〈周佛海與戴笠

海開關第二戰場呢！唐生明曾於其戰後回憶文章中提到：

由於蔣介石過早希望日本投降，在民國三十一年間便準備請美軍在東南沿海登陸，到中國開關第二戰場，蔣介石要趁這個時候利用敵偽力量徹底消滅新四軍，以免將來增加麻煩，認為李士群不肯聽從指揮，是一個大障礙，所以戴笠便向我提出殺李的問題¹¹⁴。

周佛海也曾說：「李士群一死，中央在東南秘密的抗戰工作才能順利進行」¹¹⁵。如此看來，對於日方而言，周佛海和李士群一樣具有潛在的危險性。只是一個聯絡的是共軍，另一個聯絡的是重慶和美軍，而目標則都是攻擊日軍、奪取京滬。同樣是勾結汪日的敵人中共和重慶，周佛海可以無事而李士群卻被殺是何道理？所以日方決定除掉李士群的原因除了其與中共攻打日軍的計劃外，可不可能還有個大環境的因素，那就是李士群的「中共路線」阻礙了日方與重慶的和談，戰後台灣軍統人員費雲文曾於其文章中指出：「李士群其所以竟然被日軍特務人員毒死，媚敵而死於敵，都與戴先生的巧妙運用有關。詳情如何，事關密勿，不再贅述了。」¹¹⁶，對國府而言除掉汪政權的特務首領是一件大大的好事為何不便言明？會不會和中共攻擊國府最力的所謂「日蔣和談」有關。

以上的說法並非空穴來風，晴氣的書中提到民國三十一年二月李士群捕捉吳開先惹起「總軍」的不滿，隨即於四月晴氣「突然」奉命調任華北方面軍參謀，為何時間點如此接近？李對此非常擔心曾要求和晴氣一起到華北，李的情勢竟因而急轉直下¹¹⁷。晴氣這段記述以「突然」來形容其調離，這會不會是日本政府刻意將之從李士群身邊支開？而為何這樣巧合發生在逮捕吳開先一個月之後，是不是重慶的作用呢？晴氣書中繼續描述：「此後，形勢對李士群越來越不利，同年六月，影佐少將也調到了滿洲，柴山中四郎中將接任，沒多久『清鄉委員會』被撤銷」¹¹⁸。民國三十一年夏天晴氣在華北接到李士群一封絕望的信，隨即同年八月柴山中四郎來見晴氣，商量解除李士群的「江蘇省主席」及特工領導人職務，晴氣堅持李士群也是汪政府開國功臣不應這般殘忍，柴山所持理由是李士群事事與

的勾結」收在黃美真編，《偽廷幽影錄—對汪偽政權的回憶紀實》，（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頁73。

¹¹⁴ 唐生明，〈我奉蔣介石命參加汪偽政權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總第40卷，頁65。

¹¹⁵ 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1)—簡單的自白(1946年9月)》，（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版）頁105。該自白為周佛海在南京監獄所寫。

¹¹⁶ 費雲文，《戴笠新傳》，（台北：聖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74年4月初版），頁248。

¹¹⁷ 晴氣慶胤，《上海テロ工作七十六號》，（東京：每日新聞社，昭和55年），頁195~196。

¹¹⁸ 晴氣慶胤，《上海テロ工作七十六號》，（東京：每日新聞社，昭和55年），頁196。

周佛海頂撞，擾亂南京政府，使政治局勢不穩定¹¹⁹。

柴山為何沒提李士群的中共關係?一個連汪精衛都還鼎力支持的人，說他擾亂南京政府實在不合常理，前已提到李見潘漢年是獲得影佐同意的，故李通中共晴氣不可能不知道。「總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都可以聯絡吳開先了，影佐和晴氣為何不能容許李士群溝通中共、獲取情報?會不會根本是「梅機關」與「總軍」意見不同，日本決定積極與重慶謀和後，影佐、晴氣(梅機關)及李士群的「中共關係」與「總軍」的「重慶關係」發生了矛盾了，所以代表「總軍」的柴山只得以其他不成理由的理由搪塞，或者根本柴山有提到但晴氣不好把自己和李通共之事寫出?再者李士群和周佛海的鬥爭由來已久，日方一直都不在乎，為何現在發作，而此時周佛海與重慶已取得聯繫，日方也都非常清楚，而李周相爭日方站到周這一邊，這樣日方不是在幫忙周佛海以及其背後的重慶了嗎?

若再看看周佛海一派與岡村合謀殺害李士群之過程，周佛海稱在其接到戴笠殺掉李士群的電報後，與楊惺華、馬冀良等商量，楊、馬等建議找日本華中憲兵司令部科長岡村幫忙，岡村來見周佛海後告訴周佛海請人在車站殺李士群，周認為不可行，一個月後周佛海再與岡村商量，後來為方便岡村的除李，周佛海乃透過關係聯絡日憲兵司令部，請他們將岡村調至上海工作，岡村到上海後苦無機會下手，後來岡村得到一種毒藥，一星期後才會發作，雙方乃約定由周佛海出面請李士群吃飯，由岡村接李到百老匯大樓去談話，李士群終於赴宴，並吃下被加上毒藥的西餐¹²⁰，李士群即於當天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六日被下毒，九月九日毒發身亡。由以上周佛海的筆錄可知，整個毒李的過程是周佛海與岡村精密策劃的結果，重點是乃經由重慶命令以後才積極與日方聯絡進行，日方為何配合的這麼快?胡蘭成的回憶錄提到胡至熊劍東家巧遇岡村與熊劍東等人密議著除李事，恰於當日東京批准了，按岡村極可能是取得了辻政信的同意¹²¹，因為周佛海及袁愈佳都提到日本政府派辻政信至中國割除李士群這個「毒瘤」，且據說毒殺李士群的前後幾天，京滬及滬杭兩鐵路全線戒備，如臨大敵，可見是有計劃的行動¹²²。辻政信是奉日首相東條英機之命至中國強化南京政府的，其職務是「中國派遣軍

¹¹⁹ 晴氣慶胤，《上海テロ工作七十六號》，(東京:每日新聞社，昭和 55 年)，頁 199~200。

¹²⁰ 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1)－首都高等法院審判筆錄(1946 年 11 月 2 日)》，(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 7 月第一版) 頁 200。

¹²¹ 這個說法可參考沈立行，《叛逆人生:大上海 1937~1949》，(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 年第一版)，頁 87。按作者的說法來自熊劍東之妻唐君逸，唐提到岡村是得到辻政信的同意。

¹²² 香大風，〈我所知道的李士群之死〉《春秋雜誌》，第 13 卷第 5 期，民國 59 年 11 月 1 日出版，頁 19。

總司令部」第三科科長¹²³，而「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情報課，按晴氣的說法是與李士群立場不同的，是掩護吳開先的!這樣就比較明顯了，周佛海接戴笠電後要殺李士群，但非常害怕也苦無機會，後來聯絡日本華中憲兵司令部的岡村，岡村竟得到「總軍」辻政信的同意，日方也要殺李，但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總軍」正在走重慶和談路線呢!日方竟在同一時間也要殺李，會不會真的就像大陸學者說的是要討好重慶?

再看看辻政信這個人，據稱毒死李士群後他不斷與重慶接觸和談，並多次會見汪精衛，闡述應進行對重慶的和平工作¹²⁴，為此辻政信曾異想天開準備喬裝打扮進入重慶見蔣中正，其飛回東京向東條英機說：「只是想挺身赴重慶，弄清楚對方真意後，再回來陪同閣下前去。國家的命運應由首相直接會見蔣中正來決定」，但辻政信的建議未受採納，隨即被調往緬甸，日本戰敗後，辻政信在曼谷經「軍統」人員的協助，逃過英軍追捕於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十九日到達重慶，七月到達南京，隨即被安置於國民政府國防部第二廳，此後為國民政府搜集蘇聯情報及為國共內戰獻策，民國三十七年辻政信回日本，曾寫下回憶錄《潛行三千里》，民國五十年辻政信在高棉被殺，死因不明，但可能與其情報工作有關¹²⁵。若以上資料屬實，則為何戰後辻政信會得到「軍統」及國民政府的保護?這與辻政信殺掉李士群有無關係?按大陸學者的說法，辻政信為國民黨反蘇反共不遺餘力，獻策良多，辻政信的反共是不是肇始於為「軍統」除掉倒向中共的李士群呢?以故李士群會同時被重慶與東京殺死，從各種資料研判雙方絕對有某方面之默契。李士群死後重慶終於比較安心了，可以一定程度阻止戰後中共取得京滬地區，故李士群之死對於重慶戰後的佈局實在極關重要。而利用日人除掉李士群又是重慶特務工作的一大勝利，李士群之死不僅讓我們看到重慶在一定程度掌控了汪政權，並且也以和談謀略在某些方面利用了日本政府，李士群之死也反映了大戰末期南京、重慶、東京、延安勢力之消長，而把敵方的特工首領除掉，可謂重慶對汪政府特工戰的一次決定性勝利。

著名史學家唐德剛從美國史料出發，對於李士群的死提出了一個前所未見的

¹²³ 按前述袁愈佳之說法辻政信是任第四科科長，與此處不同，見許亞洲，〈漏網戰犯辻政信〉，《紫金歲月》，1995年第6期，頁47。

¹²⁴ 對於辻政信鼓吹與重慶和談之事，周佛海日記可以佐證，李士群死後一個月，民國三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周佛海日記中曾提到：「岡田大佐來談，謂辻大佐表示，如重慶有和平意，渠當犧牲生命飛往重慶。」蔡德金編著，《周佛海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934。

¹²⁵ 許亞洲，〈漏網戰犯辻政信〉，《紫金歲月》，1995年第6期，頁48。

看法¹²⁶。唐德剛提到美軍在太平洋開始「跳島」戰爭後，本來準備要在中國東南部登陸，而當時「史迪威事件」正鬧得不可開交，史迪威一直想要取蔣「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之位置，唐稱美國方面的檔案中有所謂「戴維斯方案」(PLAN DAVIES)，戴維斯是史迪威的親密部屬，他們都厭惡國民黨的獨裁專制而同情中共，當時美國軍政當局及文化界都一致看好中共，認為中共非真共，並認為共軍可用，而延安政權也將是蔣政權的承繼者，在他們眼中毛澤東、周恩來都不是真正的共產黨。

民國三十二年史戴等密議一個「戴維斯方案」，內容是：「當美軍於東南沿海登陸時應聯合中國共產黨，共同佔領滬寧地區，並以歐洲戰場繳獲之德軍武器，大量裝備共軍，此一方案在完成前不應讓蔣介石知悉。其後應視此一共產政權為享有主權之政府，並把蔣介石的中央政府完全排斥在外」(唐原文有注明出處)，唐稱這時蔣、史關係已到破裂邊緣，然而因為中共和美方有這一暗盤，當時李士群又急於尋找舊關係(中共)，於是中共准其將功折罪，將其置於潘漢年領導之下，等待接應美軍登陸、掩護中共人員及「新四軍」，直到民國三十二年夏天太平洋軍事緊張，日軍限令江蘇省政府提供軍糧五萬噸，李士群(省主席)竟然膽敢只繳出一萬三千噸，並把餘糧賣到蘇北區「新四軍」駐地去。唐得出一個結論即日本和重慶都不能容忍李士群與蘇北新四軍勾搭，來接應登陸美軍，因此都想要把李士群殺掉。

此外，唐又分析戰後為何毛澤東親自點明批判潘漢年?使潘後半生在牢獄中渡過?這點後來替潘寫翻案文章的大陸學者都百思不解!(不知是不是真的不解!)唐指出那是因為戰後中共與美蘇敵對，而潘不僅戰前與美蘇有良好關係，且戰前毛澤東、周恩來曾一度要訪美。毛竟曾要訪美！這個只有少數如潘漢年等戰前情報首領知道，於是毛既要對抗「蘇修」與「美帝」當然要湮滅證據、殺人滅口!唐又說潘漢年是周恩來的人，一度毛要鬥倒周故先拿潘漢年開刀，所以造成「潘漢年冤案」。¹²⁷被潘所派聯絡李士群的關露，戰後入獄最後自殺的下場應該也是這個理由吧!如果唐文可信(唐稱在美國與潘之家屬談過)這麼看來無非中國歷史又重演了一齣兔死狗烹的戲碼。然而唐德剛的說法頗有可取之處，尤其所引「戴維斯方案」頗令人吃驚，因為按一般史料看來都是美軍登陸中國東南，重慶軍隊

¹²⁶ 唐德剛為吳開先女婿，吳曾告訴唐，李士群是因汪政權內部鬥爭而死，但唐並不相信這種說法。唐德剛，〈李士群為「通共」被殺的種種瓜葛〉，《傳記文學》，第 67 卷第 5 期，民國 84 年 12 月號，頁 25。

¹²⁷ 唐德剛，〈李士群為「通共」被殺的種種瓜葛〉，《傳記文學》，第 67 卷第 5 期，民國 84 年 12 月號，頁 25~33。

要準備接應所以必殺掉李士群(唐生明如是說)¹²⁸，然若如唐德剛言則接應的最後可能是共軍，如果唐之說法可信，那麼重慶的情報人員一定知道這個消息的，這樣李士群更是必死無疑了。

此外不少的論著只提到李士群的死是內部鬥爭的結果，但我們若看看周佛海接到戴笠電報時的反應就知道，光靠周佛海等人是萬萬沒那個膽去殺李士群的。唐謂戴笠同時下對李之制裁令於自己及周，周佛海接到這一任務後非常緊張，深怕稍一不慎，自己及全家馬上會被李殺掉，當周來到唐家裡得知唐也知此事後非常驚慌，要唐勿再將此事洩露，周一一直怕惹出殺身之禍¹²⁹。日方也是一樣的，上海日本憲兵隊岡村在熊劍東家裡商量除李後，熊提到東京已裁示解決李士群，此刻只擔憂汪精衛的反應，有了東京的指示竟還有顧慮，這幾點都透露了汪政府的內鬥決非李士群被殺的關鍵因素，理由很簡單，因為沒有人有這實力，連周佛海都不行，但若重慶執意這麼做，則周佛海與日方都不得不配合。

李士群死後，「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部」被取消，改稱「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特工總部」即原「七十六號」改稱「政治保衛局」，隸屬於「政治部」之下，以軍委會參謀本部參謀次長黃自強為部長，萬里浪、胡鈞鶴分任「政治保衛局」正副局長¹³⁰，周佛海曾公開宣達此後特工方向，周佛海在李士群死後一個月即十月十三日，曾對胡鈞鶴表示今後特務工作的方向：

今後特務工作須注意兩點：一為減少日本色彩與關係，使之成為純粹中國政府之機關，二為對渝取守勢的行動，勿取攻勢。即對於實行恐怖行為之份子，為維持治安自應適當處置，對於情報人員，則可聽其自然，至對於策動反抗南京政府之份子，加以監視可也¹³¹。

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十三日周佛海再於日記中提到：「下午，接見胡鈞鶴，談特務工作問題，告以今後須移重點于對付共產黨」¹³²，改組後的汪政府特工其任務有很大轉變，甚至竟對重慶不採敵意而最後將矛頭完全對準中共，沒有日方的默許能這樣做嗎？然而可笑的是難道周佛海不知道胡鈞鶴是中共份子嗎？(周佛海曾將胡鈞鶴、潘漢年、黃敬齋的合照提供給日方)還是大家都演戲演慣了。

¹²⁸ 黃美真等人也如是說。黃美真、姜義華、石源華，《汪偽七十六號特工內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一版)，頁160。

¹²⁹ 唐生明，〈我奉蔣介石命參加汪偽政權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總第40卷，頁65~66。

¹³⁰ 馬嘯天、汪曼雲遺稿，黃美真整理，《汪偽特工內幕—知情人談知情事》，(新鄉:河南人民出版社)，頁159。

¹³¹ 蔡德金編著，《周佛海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933。

¹³² 蔡德金編著，《周佛海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988。